善政革命: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研究

廖 军 苏志宏

【摘 要】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从自身实际出发,进行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共产党革命性创建了边区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创造性开展“三三制”民主建政,实施边区民众各得其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善政,不断改善和提高边区民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激发和调动边区各阶层抗战积极性,巩固了根据地和边区政权,也为其他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发挥了示范性和先导性作用。晋察冀边区政权作为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重要发端和实践典型,具有自身特色,且迄今在阶级合作、实事求是、价值导向等方面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 键 词】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善政;新民主主义

【作者简介】廖军,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苏志宏,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成都 614202)。

【原文出处】《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成都),2021.2.24~31

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敌后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边区作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的前哨阵地,孤悬敌后,又地处“堡垒如林、沟墙如网的广大战场”和敌、伪、顽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的复杂环境,[①]屡经敌寇的扫荡蚕食,加之天灾肆虐,与陕甘宁等其他抗日根据地相比,其生存和发展条件更为艰苦。在这种独特而艰难的环境下,边区结合自身实际革命性地建立完善了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权,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其他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和全国性革命政权的建立发挥了示范性、先导性作用,被党中央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②]边区在敌后夹缝中顽强生存、坚持抗战,并积极开展新民主主义的善政与良治,为新时期政权建设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实践基础和价值导向,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学界在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研究方面更多关注陕甘宁边区,对晋察冀边区政权的构建、政权的特点、施政措施和效能等方面研究相对薄弱。本文重点论述晋察冀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独特探索与创造性实践,并从阶级合作、实事求是、价值导向等方面探析其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

一、革命性创构:边区政权的构成与组建原则

晋察冀边区政权是随着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扩大而建立健全的。边区把政权建设作为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和革命的中心问题,从1937年10月聂荣臻率一一五师一部在五台山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始,直至1943年1月边区隆重召开第一届参议会,边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性地建构了从边区级、县级、区级直到村级的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治体制在华北敌后的抗日根据地趋于成熟和完善。

晋察冀边区政权机构主要由边区、县、区、村各级民意机关和行政机关组成。边区各级民意机关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包括村代表会、区政会议、县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政会议和边区参议会;边区各级行政机关由民意机关选举产生,包括村公所、区公所、县政府和边区行政委员会,各级行政机关都建立有民政、财政、教育、实业、司法等工作部门,构成完整的政府职能机构系统。各级民意机关是全权的机关,有选举、罢免、召回、撤换政府行政人员,以及创制、复决的权力,"是同级政府的'上司'"。行政机关作为民意机关的"下属",其组织构成和负责人由"民意机关选举,并由民意机关罢免","对民意机关(边区参议会及县议会等)的决定有绝对服从的义务"。[③]除各级民意机关和政府机构外,边区还组织成立了军需供给、除奸谍报、管理商贸、推动生产、开展社会教育等机构,这些机构"配合上各级政权机构形成的辐辏",[④]整体构成了边区政权工作体系,为全国革命政权体系的建立搭建了雏形。边区政权是唯一被国民政府承认的敌后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权,对其他根据地政权建构提供了实践依据和参考借鉴。

直接普遍平等的民选原则是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唤醒了边区民众的民主意识,有力动员了边区民众共同参与政权、保卫边区和抗击日寇。边区成立之前,民众缺乏民主体验,民主意识淡漠。直到边区成立之后,通过教育引导,边区民众才体会到属于自己的政权的重要性,实现了逐渐由对民主政治的漠视,到正视,再到珍视的转变,积极踊跃参与和捍卫边区政权。边区采取直接的、普遍的、平等的、无记名的投票方式进行民主选举,规定除了汉奸、被依法剥夺权力和精神病患者外,"凡在边区境内之人民,不分性别、职业、民族、阶级、党派、信仰、文化程度、居住年限,年满十八岁者,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后,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⑤]边区境内的蒙古人、西藏人、满洲人、回族人与汉人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在政治经济社会上均一律平等,在选举时也逐渐取消对少数民族选民比例的限制,真正实现无差别的民主。在组织选举中,边区结合农民文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通过歌曲、戏剧等老百姓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方式,动员和激发边区全体民众参与民主选举。如行唐县"以敲锣打鼓、唱歌、演讲、写标语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民主选举的内容和意义,掀起选举高潮。演唱的歌曲有《宪政是什么》《大家选举要慎重》《我们实行宪政》《为聂司令员竞选参议员》等"。[⑥]上北庄则组织业余戏剧社、啦啦队、宣传队等在街边村头给边区百姓演艺民主与选举的戏剧、舞蹈。[⑦]选举过程中,边区采用投豆、画圈、背箱、烧香洞等多种方法以实现普选、民主的目的。民选不仅成为边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还成为了边区的一件喜事。在北岳区选举时,年轻姑娘、刚过门的媳妇、临产的孕妇、卧病多年的老太太,都穿上节日服装成群结队进入选举会场,在选举结束后,还举办盛大的庆祝演出,"选举大会的仪式是辉煌庄严,会场是热烈紧张。人们都把这一天看作一个盛大的节日,这是晋察冀人民的大典"。[⑧]边区的民主选举,改变了边区民众对民主政治的漠视,培养了边区民众的政治意识、政权意识和民主意识,也扩大了边区政权的群众基础和民意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夏的民主选举运动,全边区平均参选人数占选民总数的81.9%,晋察冀区参加区选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80%以上,参加县选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86.3%,参加边区参议会选举的选民占全部选民的91.1%;中心区的阜平、平山,参加选举的选民占选民总数的98%,有的村达到100%,而且游击区举行的秘密选举,参加选举人数也在70%以上。[⑨]边区的选举运动也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肯定,《新中华报》头版社论中指出,晋察冀边区1940年夏的选举运动"其成就是伟大的,其在政治上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它奠定了彻底实现新民主主义政治,更加巩固和发展晋冀察边区坚持敌后抗战的坚实基础。这一选举运动的经验,应成为全国首先是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民主建设上宝贵的参考和借镜"。[⑩]《解放日报》也盛赞边区的民主选举,称晋察冀"从边区到村级的民意机关,都由严格的普选产生。在当时乃至今天,这种成绩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都还是创举"。[⑪]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三三制”建政原则是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的又一基本原则,既有力巩固和扩大了执政基础,更团结了边区各界民众捍卫政权、保卫边区、抗击日寇。在1940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实行“三三制”建政方针之前,[12]晋察冀边区已具有相对较长时间的建政实践。与陕甘宁边区不同,晋察冀地处华北抗日前沿、孤悬敌后,为实现全民抗日,团结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阶级、阶层,边区一直比较注意在各级政权中吸收同情支持抗日的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代表。据1939年的统计,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中,国民党的人数占20%以上,其他的党派占到5%;边区行政委员会的各处处长、秘书主任、各科科长、各专员、各县长绝大部分均由大中学生和师范生构成;边区行政委员会的秘书中有4个和尚喇嘛,凡是回民聚居的地方,也安排了许多回民干部。[13]边区政权代表性广泛、群众基础扎实的鲜明特色,既使政权更加巩固,也使抗战力量更加壮大。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三三制”建政原则,边区以1940年夏民主选举运动为契机,直到抗战结束,始终坚持将“三三制”作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原则和工作制度,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极大地巩固了边区政权的基础。

边区党委于1940年6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在边区实现新民主主义政治和促进全国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的决定》,同时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县区村暂行组织条例》《晋察冀边区参议会暂行组织条例》《晋察冀边区暂行组织条例》,并于8月30日公布实施《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总共二十条,被称为“双十纲领”,作为边区政权建设和施政的最高法律依据,纲领被中央誉为“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典型”,“最适合目前抗战需要的,同时又是目前全国模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的施政纲领,全国各地,特别是敌后方其他各抗日根据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设施计划上,都应以它为最好的参考和借镜”。[14]纲领明确要求“彻底完成民主政治建设,健全各级民意机关及政府机构。在民意机关和政府人员中,争取并保证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15]上述有关组织条例和“双十纲领”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晋察冀边区“三三制”建政的正式法理化推进。在组织选举推进落实“三三制”过程中,边区针对各级政权特别是村政权中党员占绝对优势,非党的同情抗日的地主、资本家等极少参与政权的情况,通过积极动员和鼓励引导其参加竞选,安排其参加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甚至直接聘请任职等多种方式,将开明的地主士绅和支持抗日的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分子吸收到各级政权中来。比如1943年1月第一届参议会的主席团参议员就“多为有声望之老同志,故有人说‘主席团的胡子接连起来,恐怕比全会人们的胡子还要长’”;[16]同时采取当选的党员议员辞职的方式扩大政权各方面的代表性,“以弥补选举中的缺憾”,[17]努力实现各级政权的中共党员、抗日民主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结合敌后战事频繁、个别县政权尚未稳固的实际,边区还广泛开展敌伪军、伪政权以及敌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县议会吸纳大批有声望的绅吏联庄首领,在敌我连接区选举开明士绅为村长,且清算村长也仅限本届,要求“牵涉的人系越少越好,牵涉的年月系越短越好”,[18]避免激起豪绅团结勾结敌人,以最大努力实施“三三制”,争取多数、孤立敌人。通过一系列创造性的举措,1940年夏秋间边区的民主大选举和1943年1月边区参议会、行政委员会选举,许多县份实现了“三三制”,边区最高权力和行政机构都实现了“三三制”。如北岳区民主选举县议员,完县、建平、唐县、定襄等县当选的议员基本达到了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与选举前的政权人员成分相比,中间分子数量也大有提高,与陕甘宁边区1941年8、9月间的县选相比,党外人士直接当选比例普遍更高。[19]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选举的边区参议会议长成仿吾、副议长于力都是大学教授,驻会参议员办事处(边区参议会常设机构)的7名委员中,共产党员仅2人,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占三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分之二以上，选举的边区行政委员会9名委员中，共产党员3人，国民党员2人，无党派民主人士4人。可以说，晋察冀边区的民主建政实践，既为中央制定“三三制”提供了实践依据，又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三三制”，并使“三三制”成为边区民主政治和政权建设过程中的鲜明特点和基本要素。彭德怀对边区的“三三制”建政给予了高度评价：“经验证明，那(哪)一地区三三制实现得比较好些，根据地也就比较巩固些。晋察冀边区是最好的例子。”[20]

二、善政与良治：充分调动边区各阶层抗战积极性

晋察冀边区政权，“站在全民族、全体人民的立场，坚持着坚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积极进行一些对抗战、对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民有利的善政，并善为调处各阶级阶层间的关系和摩擦”，[21]积极推行让边区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等等能够“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22]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的同时，着眼于生产力低下、文化水平落后等社会现实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实行团结抗日的文化政策和社会政策，极大地强化了边区政权的凝聚力，增强了各界群众团结抗日的自信心，最广泛地动员、团结和联合了边区各阶层人民，有力巩固了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也为巩固和扩大边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一，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让边区地主和农民各得其所、团结抗战。边区实行以地主债主减租减息、佃户债户交租交息为核心的“互让而又有利改善民生”[23]的土地政策，颁布并实施《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1938年)、《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1943年)等法例，普遍实行二五减租，保证地租不超过总收成的375‰，债款年利率不超过10%，以合理调节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的厉害关系和紧张局势，保障地主和农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和土地所有权，“巩固了农民已得的利益”，“得到了广大地主的拥护”，同时“巩固了地主与我们的抗日合作”，[24]令边区的地主和农民各得其所。通过边区土地政策五年来的普遍实施，“不但广大农民的生活得到了适当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动员了广大人民积极的参战，地主与农民间的纠纷，得到了适当的调节，巩固了农村的团结，坚持了抗战”。[25]边区还推行有免征点和累进最高率的统一累进税，[26]停征田赋，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特别在对待反共派、顽固派、汉奸之类的土地、财产等问题上，明确要求“对反共派、顽固派及伪军官兵之财产、土地，不得宣布没收；全家逃亡敌区的汉奸嫌疑犯之土地、财产，可由政府暂管，待其重回边区抗日时发还之”。[27]对政府没收和暂管的土地则低价出租给农民或分给被日寇摧残的农民，或者充作优待抗属的公田。在关涉边区民众最核心利益的土地和财产问题上，以最大的诚意、最实的举措有力调处了边区各阶级阶层、各中立和右派、敌对分子的关系，广泛地团结了边区力量共同抗日。

其二，改善工人待遇的劳动政策让边区资本家和工人各得其所、团结抗战。边区的劳动政策以改善工人生活、资本家有利可图和劳资契约自由为核心，使工人的工资得到增加、待遇得到提升的同时，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纪律性，以保证“富农经营和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得以顺利发展”，[28]使工人和资本家各得其所。边区颁布实施的“双十纲领”明确规定，要“减少工作时间，实行工业部门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人实际工资，实行半实物工资制；改良劳动条件和工人待遇，安置失业工人，雇主不得违约解雇”，[29]以保护工人的利益，维护工人的权益；边区还要求工人遵守劳动纪律，教育工人如果无休止地要求涨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到最后只能是工厂倒闭、自己失业，以此确保富农经营和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得以顺利发展，使得资本家有利可图；同时强调契约自由的原则，保证工人有上工的权力，资本家也有解雇工人的权力，既鼓励了资本家努力发展生产，又强制了资本家改善工人待遇，同时也教育了工人遵守劳动纪律，有力促进了边区经济发展繁荣。边区政权实施的劳动政策使工人和资本家各得其所，有效调节了劳资矛盾，有力凝聚了二者的力量一致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抗日。

其三，发展商品生产的经济政策奠定了边区长期抗战的经济基础。边区着眼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社会现实，积极构建、扶持与之相适应的商品经济的生产关系，鼓励和引导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节制资本以防止私有资本操纵国计民生，极大促进了边区经济发展，为长期抗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边区政权认识到，要巩固和扩大边区，使边区成为新中国的模型，“私营经济是要尽量发展的”，“边区经济发展的趋向于资本主义生产是必然的”，在大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要开展“左”和“右”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在有限制地引导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方针指导下，边区积极发展军事工业和轻重工业，与边区银行一并纳入公营事业，大商业也采取公私合营、以公为主、走向完全公营的方式经营，有力防止了私有资本控制边区国民生计；同时鼓励地主离开自己的土地，踊跃向商业投资，“促使边区土地分散，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开辟一条大道”，鼓励私有资本投入工业部门，并在合理负担的实行上对私有资本“给以优待，大方的给私资发展”，[30]有力促进了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到1941年8月，边区小商品经济在边区经济比重中占据优势(土地占50.94%，人口占50.12%，人力占49.27%，畜力占58.2%)，雇农、贫农在边区阶层占比也大幅上升(雇农上升超50%，贫农上升近30%)，中农变化不大，富农、地主下降约40%。[31]边区在克服日寇掠夺和自然灾害，使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并保证边区各抗日阶级的经济利益的同时，实行精兵简政、节省开支，将边区收入的五分之四用于军费，[32]为团结抗日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其四，抗日救亡的文化政策提升了边区全民文化素质以共同抗日。边区将抗日救亡作为文化政策的出发点和主要内容，积极推行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国民教育。在组织领导上专设国民教育科，制定并实施《晋察冀边区民众学校暂行规程》，强化和规范国民教育；在内容上加强民族民主革命教育与科学教育，“在游击区中彻底粉碎了敌伪的奴化教育，在敌寇不断的摧毁之下，坚持了抗日的政治和文化教育”；[33]在力量上大量吸收和鼓励知识分子担任教员，提高教员质量、改良教员生活，同时“力求同有正义感的名流学者公正士绅实行统一”，[34]以争取和团结中间力量；在形式上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一方面建立健全学校教育，实行普及的义务的免费的初小教育，积极恢复和建立中学和抗大、华北联大等高级专门学校。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39年，边区“有百分之七十的行政村建立了初级小学”，“尤其在冀中和冀西游击区中，公路纵横，据点林立，在我政权实际管辖下的地区和人口，已较抗战前减少，而学校与学生数目则均较战前增加”，[35]1940年的“学龄儿童入学比例，北岳区达百分之九十七点一九”；[36]另一方面广泛开展社会教育，建立如救亡室、俱乐部、民众教育馆之类的普通民众文化教育活动中心，开办各种民众学校、午校、夜校等各种形式的识字班，积极开展针对边区广大普通民众的冬学运动，“得以以极少的财力和人力，使极大数目失学的成年、青年和儿童普遍受到了政治和文化教育。这是远悬敌后的边区文化教育运动伟大开展的重要环节和最大特点”。[37]同时，边区还组织成立了边区文化界救亡联合会，领导开展边区文化救亡活动，“以现实斗争为文化的创作的基础”，[38]将反帝反封建斗争作为边区文化斗争的方向。通过一系列抗日救亡的文化政策，有力提升了边区民众的文化素质，激发了爱国救亡的民族情怀，坚定了抗日救国的信心和决心。

其五，自由平等的社会政策推动了边区民众团结抗日。边区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男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家庭地位上，一律平等，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这是边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种表现”。[39]“双十纲领”规定，“保障妇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及家庭地位之平等，妇女依法有财产继承权；男女婚姻自主”，边区婚姻条例也明确规定，男女结婚离婚均自由、自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主、自愿，同时对抗战军人以适当保障，一改过去妇女被当做商品和奴隶买卖奴役的状况。边区针对境内汉、回、满、藏等多民族聚居的现状，提出“相互尊重生活、风俗及宗教习惯，在平等基础上亲密团结抗战”，同时对贫苦无依的少数民族同胞进行帮扶救济。[40]自由平等的社会政策让边区妇女得到解放，让边区少数民族得到尊重，推动了边区民众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三、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的当代启示

从政权的组织构成以及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及效能来看，晋察冀边区政权是包括了边区无产阶级、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支持抗日的开明士绅、知识分子等各抗日阶级、阶层“联合专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边区人民自己的政权。边区政权鉴于立足华北敌后的复杂环境和巩固扩大边区的现实需要，通过一系列让边区民众各得其所的政策，改善边区各界民众物质文化生活，“照顾着全局，照顾着这一阶级又照顾着那一阶级”，以巩固团结，“启发广大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强固抗战力量”。[41]边区政权建设的实践，“在晋察冀群山之中已造成了一个奇迹”，成为“近代史中民主政治的建设上一个向所未见的极为重要的试验”，[42]它“既是对一个旧社会的改造，又是对一个新社会的开创，具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雏形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性质”，[43]作为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重要发端和实践典型，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人民民主政权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实践基础和价值导向。

一是强调阶级合作的统一战线理论。晋察冀边区将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在政权组建方面实现了最大限度的阶级合作，由土地革命时期仅仅“代表工农”而强调阶级斗争为重点的“工农民主专政”，转向抗日战争时期“代表民族”而强调各抗日爱国阶级合作为重点的“人民民主专政”，特别通过“三三制”的制度安排和推进实施，为资产阶级和其他具有革命倾向的人群敞开了参政议政的大门。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凸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权建设理论的创新发展。边区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国情和边区的具体实际进行的政权建设探索与实践，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最具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其中，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党派合作、多元主体协商共治为主要特征的“三三制”，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来源和最早雏形，“既回应了民主的挑战，又找到了革命的合力”，[44]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强大生命力以及巨大的内在弹性和包容性。

二是服从经济发展规律的实事求是路线。晋察冀边区政权根据敌后边区战争频繁、工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严重低下的现实，承认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坚持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同时积极开展了有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的伟大实践，为巩固边区政权，建设新民主主义雏形并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经济基础。这为中国共产党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从实际出发判断中国基本国情，以及正确定位和深化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更印证了边区政权坚持生产关系的建立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遵从经济发展规律、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正确前进方向。

三是遵循“各得其所”的基本价值取向。晋察冀边区遵循新民主主义“各得其所”的核心价值诉求和基本价值取向，[45]通过妥善处理边区各阶级、阶层的关系和摩擦，在政治、经济、社会政策等方面积极实施对各方面都比较有利的“善政”，不断以适当方式和步骤减轻和限制封建残酷剥削，缓和社会不公，改善人民特别是工农生活，让边区地主、农民、资本家、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工人等等能够各得其所，使一切抗日人民都能有说话的机会和权力、有衣可穿、有饭可吃、有事可做、有书可读，充分保证各个方面的利益，从而团结边区一切抗日力量以夺取抗战的胜利，最终维护和实现边区民众的根本利益，“这就是边区政权最大的特点”。[46]“各得其所”是晋察冀边区政权的核心价值诉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价值取向上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历史遵循。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人共享、各得其所，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的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47]才能不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概言之，从阶级分析角度来看，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以工农大众为革命、改革、建设的主要力量和主要依靠，实行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专政，实现工农大众的自由解放和民主幸福，是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的基础和立足点；从统一战线角度来看，边区政权除了代表和维护工农大众利益外，兼顾其他阶级、阶层利益，团结其他阶级、阶层共同实现革命、改革、建设的目标任务，将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彰显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时代性和普遍性相统一的实事求是品格；从社会发展形式层面角度看，强调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为向社会主义顺利过渡准备充足的物质条件，进而实现人的个性解放和全面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高度统一；从价值取向角度来看，满足和保障“各得其所”的价值诉求以实现抗战胜利、民族解放和人民的自由幸福，是党的人民性这一根本属性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集中体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创新发展的进程中，晋察冀边区政权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在阶级合作、实事求是、价值取向等方面，仍然闪耀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权建设的价值光辉。

注释：

①《聂司令员在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讲演》，《晋察冀日报》1943年2月4日，第4版。

②《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主席团致晋察冀边区电》，1938年10月5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199页。

③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28页。

④《晋察冀边区政权工作检讨总结》，1939年7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档案馆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9页。

⑤《晋察冀边区暂行选举条例》，1940年6月15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档案馆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296页。

⑥晋察冀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协作组编：《晋察冀革命文化艺术大事记》，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4页。

⑦杨巍：《行唐上北庄的民选》，《抗敌报》1940年8月9日，第1版。

⑧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92页。

⑨谢忠厚、肖银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年，第203页。

⑩《晋察冀边区民主建设的新胜利》，《新中华报》1940年11月10日，第1版。

⑪《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的成功》，《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第1版。

⑫1940年3月6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中首次提出了“三三制”的建政原则。紧接着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毛泽东再次对抗日根据地政权“三三制”问题进行了阐述，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

⑬谢忠厚等：《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简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5页。

⑭《中共晋察冀边委的施政纲领》，《新中华报》1940年10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月3日,第1版。

⑮《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1940年8月13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第401页。

⑯《大会点滴》,《晋察冀日报》1943年2月5日,第1版。

⑰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第49页。

⑱彭真:《在许、姚考察后对冀东、平北工作意见》,1941年8月17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档案馆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3页。

⑲陕甘宁边区根据中央“三三制”建政要求,于1941年1月1日颁布《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2月初在裴庄乡选举试点,6、7月间完成乡选,8、9月间开展了县和边区参议员选举,在县级和边区级选举中,尽管边区做了很多工作,但投票结果非党候选人尤其是开明士绅落选者甚多,共产党员占比非常大。10月份,边区通过聘请大量落选的非党候选人为县级和边区级参议员,才大致符合了“三三制”原则要求,但具体到各县差别仍然很大,原苏区党员当选比例偏高,如延安县党员占比56.7%,原统战区共产党员比例则不到三分之一。

⑳彭德怀:《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节选),1940年9月25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档案馆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413页。

㉑彭真:《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1938年10月13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第211页。

㉒《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3页。

㉓《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〇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页。

㉔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第90、94页。

㉕《论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晋察冀日报》1943年2月13日,第1版。

㉖晋察冀边区根据中央统一战线财政政策制定的税收制度。即统一税种,废除其他苛捐杂税,且由边区统一征收;按照纳税人的“富力”状况,依据贫富等级设定递增百分比且限定了最高税率。该税制扩大了负担面,有力减轻了贫苦者负担,也考虑了富有者的负担能力,使各边区各社会阶层、阶级负担适当,有力推动了边区工商业和农副业发展,得到了边区各界的拥护支持。

㉗《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1940年8月13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第403页。

㉘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第102页。

㉙《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1940年8月13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第402页。

㉚宋劭文:《晋察冀边区经济发展的方向与现阶段我们的中心任务》,1940年8月,魏宏运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96、303、293页。

㉛张苏:《边区经济发展的现状与我们的经济政策》,1941年8月,魏宏运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14-415页。

㉜《宋主任继续报告政府工作》,《晋察冀日报》1943年2月7日,第1版。

㉝《论晋察冀边区的文化教育运动》,《抗敌报》1940年8月25日,第1版。

㉞《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国民教育的指示》,1940年4月20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档案馆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9页。

㉟《论晋察冀边区的文化教育运动》,《抗敌报》1940年8月25日,第1版。

㊱《宋主任继续报告政府工作》,《晋察冀日报》1943年2月7日,第1版。

㊲《论晋察冀边区的文化教育运动》,《抗敌报》1940年8月25日,第1版

㊳彭真:《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会议上关于文化运动的结论》,1941年1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下),第490页。

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我们的婚姻条例的指示信》,1941年7月7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北省档案馆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9页。

㊵《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1940年8月13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第403、404页。

㊶《论边区人民生活的改善》,《抗敌报》1940年8月23日,第1版。

㊷班威廉、克兰尔:《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观感》,《晋察冀日报》1943年2月19日,第1版。

㊸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364页。

㊹王建华:《改造民主:抗战时期"三三制"选举的革命面像》,《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第125页。

㊺苏志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公民认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8页。

㊻彭真:《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扩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40年9月1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第436页。

㊼《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15页。

Revolution in Good Govern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Shanxi-Chahaer-Hebei Border Area Regime

Liao Jun Su Zhihong

Abstract: As the first Anti-Japanese Base created by the CPC behind enemy lines, the Shanxi-Chahaer-Hebei border area started to explore and practi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gime, establishing the public authority and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at various levels in the area, carrying out the "three-thirds system" democratic political construction creatively, implementing the Anti-Japanese United Front policy, improving the material and cultural life for people, and arousing the enthusiasm of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take part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se measures consolidated the base and the border area's regime, setting a good example to other Anti-Japanese Base administrations. A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and practical exampl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democratic regime, the Shanxi-Chahaer-Hebei border area regime not only has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ha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in class cooperation,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value orientation and so on even in today's society.

Key words: Shanxi-Chahaer-Hebei Border Area; construction of regime; good governance; New Democracy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